

译者性别身份与翻译诠释：《面纱》三个译本中的性别形象再现

夏 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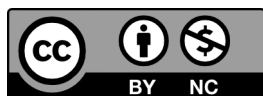
摘 要 | 译者作为文本再创作的主体，其性别身份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学翻译中，这种性别身份还会对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从而使译作中的女性主义表达或性别形象塑造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毛姆在《面纱》中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展现出了强烈的男权主义与女性意识对比，呼吁女性实现自我独立。然而，不同性别的译者在还原小说中的男女角色形象时出现了显著差异，女性形象在男性译者的译文中并未受到公平对待，说明译者的性别身份会对译文中男女形象的刻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译者需要摆脱性别身份的局限，主动建立性别意识，发掘人物细微的情感变化，使用不同的性别语言平等地对待原作中的每一个人物，从而更加准确地传达原作思想。

关键词 | 性别身份；文学翻译；翻译诠释学；形象再现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毛姆的《面纱》讲述了一位名为凯蒂的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成长的故事，通过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成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自负傲慢的查理代表着主导权力话语的男权主义，天真顺从又渴望自由的凯蒂则象征着被压抑的女性意识。小说通过描绘两性形象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揭示了父权社会下女性在爱情和婚姻选择上饱受压迫的现实，一定程度上是在呼吁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显然，成功的性别形象塑造决定了原文中女性主义思想的表达。然而，在《面纱》汉化的过程中，不同性别

的译者在译文中重现人物形象时存在明显差异，女性译者更擅长发掘女性角色的内心情感，而男性译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形象的表现力，反而强化了男性语言中的权利和地位。这引出了本文研究的两个问题：译者的性别身份是否会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译作中反映出的性别成见是如何产生的？基于此，本文拟以《面纱》的多个中文译本为研究个案，基于斯坦纳的诠释学翻译理论框架，比较分析不同性别译者在同一人物形象再现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之间的异同，考察译者性别身份对翻译效果的影响。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性别视角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二、译者性别与翻译研究

译者性别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兴起。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译者主体性”为基础，但关注点不同。译者主体性研究多以译者的文化背景、所处时代、审美等因素为研究重点，而女性主义译者以“译者性别”为重要考量因素。徐来（2004：18）指出，在有关译者主体性的各种讨论中，性别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有关译者性别在翻译中的探讨，更多地是关于男女平权的问题，“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徐来，2004：18），目的是维护女性译者在翻译工作中的主体性，并呼吁正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译者性别身份的讨论，主要是其对译者性别意识的影响。这两者均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重要考察因素。早在二十一世纪初，查明建（2003：22）就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等多个方面论证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仅从语言层面或以‘忠实原作’的标准来研究翻译，会导致翻译主体被遮蔽，无法体现译者真正的文化创造性”。而译者的性别身份作为译者主体性研究的重要关照对象，是研究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突破口之一。早期女性主义翻译学者主要关注女性作者作品翻译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以及如何让女性在翻译中受到平等对待。谢梨·西蒙（Simon，1996）对性别意识的定义是一个人对性别的意识，即他们意识到性别在人类互动和生产力中发挥着作用，认为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意识提出了关于社会成见与语言形式、语言政治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关系等重要性问题。加拿大著名翻译学家芭芭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先锋之一，她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将性别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基本组织范畴。“而翻译是一种诠释行为，因而会受到译者性别的影响”（李红玉，2009：65）。路易斯·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1997）是女性主义翻译流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在其著作《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中探讨了女性主义译者使用的具体翻译策略，认为译者性别意识包括对母语与目的语性别价值差异的认识，以及在翻译中改写和补偿女性在文本中的形象。

通过早期女性主义翻译学者对女性主义、译者性别以及翻译实践三者之间关系的描述，可以说译者性别意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作者和文本中所表现出的性别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它影响着译者在采取翻译策略时所持的立场。本文主要从性别与翻译的视角出发，探讨译者性别身份对性别意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在翻译实践中发挥作用。

三、《面纱》译本中的人物形象构建

本文选取的三个译本是近些年较新且在读者群体中口碑非常高的译本。女性译者张白桦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理事，短篇小说翻译作品逾350万字，具备深厚的文学翻译功底，其翻译的《面纱》于2018年在中译出版社发行；男性译者方华文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此前也翻译过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例如《傲慢与偏见》，其《面纱》译本于2021年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发行；另一位男性译者黄永华同样文学翻译功力深厚，其《面纱》译本于2020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并于同年在豆瓣读者中收获了非常高的评价。这三个译本包含了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的翻译视角且受众广泛，代表了近年来大多数读者对《面纱》的印象。本文以这三个译本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不同性别的译者在重现原文性别形象上的异同。

（一）人物侧写中女性形象的再现

在对比三版译文时，发现男性译者在翻译男性角色语言或者有关女性形象的描述上，译文中的男性立场鲜明且带有一定的性别成见。本部分主要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译者性别身份对表现女性形象的影响。

例1：Mrs. Garstin did not mince her words in the domestic circle and she warned her daughter tartly that she would miss her market.

张白桦（女）译文：加斯汀太太并没有在自己小圈子里明说，她只是严厉地警告女儿，这样下去，她会错过最好的行情的。

方华文（男）译文：加斯廷夫人在家人的小圈子里说话直来直去，辛辣地警告女儿说，她就要错过行情了。

黄永华（男）译文：贾斯丁太太的这番话倒并没有跟她朋友圈里的人说，她只是告诫女儿，她很快便会成为剩女了。

例句引自原著第八章,凯蒂的母亲贾斯丁太太告诫凯蒂,要趁还年轻漂亮的时候把自己嫁出去,否则就没有男人要。黄永华将“miss the market”意译为“剩女”,尽管在语言表达上更贴近读者,但“剩女”一词本身就带有性别歧视,它将女性个人价值与婚姻状况挂钩。在原文并无明确词意指向“剩女”一词时,男性译者在译文选词上带有自己的主观倾向。女性译者张白桦和另一位男性译者方华文的译文并无明显差别,均按照原文表述忠实地翻译,说明男性译者在译文中表现出的性别成见具有个人特征,但这种特点的确更易在男性译者身上出现,下文分析能够提供例证。

例 2: Women always are unfair and they generally manage to put a man in the wrong.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on the other side.

张白桦(女)译文:女人总是喜欢不公正,讲歪理,把男人置于过错方。其实,她们自己也有问题。

方华文(男)译文:女人总是这么不公平,一出事就把过错推到男人身上,使男人有口难辩。

黄永华(男)译文:女人总是头发长见识短,通常情况下,她们总要把错推到男方身上,却不知自己身上也有许多需要检点的东西。

本例引自原著第二十六章,是查理面对凯蒂歇斯底的哭诉和指责时的回应。黄永华将“Women always are unfair”译为“女人总是头发长见识短”,对原文进行了归化处理,但实际含义与原文有所出入,且译文中带有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此外,男性译者在译文中不自觉加深了小说中男性人物的语气,从而使这句话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厌恶也有所加深。

方华文将“But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on the other side”处理成“使男人有口难辩”,含义与原文存在细微出入。原句的意思是“女性倾向于将男人置于过错方,实际上她们同样有问题”。翻译成“使男人有口难辩”是一个明显带有男性立场的译文,而张白桦的译文保持了查理在原文中的形象。这个例子中,男性译者在翻译男性人物的语言时更易带入自身的男性视角去审视语境,因此不自觉地调整了原文的信息,放大了角色的性格特点,体现出译者的性别身份对其性别意识的影响。

这样的例子在原文中还有很多,男性译者笔下的查理,男性意识更加鲜明,女性形象则出现一定

程度的变形。例如,查理说“*Oh, my dear, it's rather hard to take quite literally the things a man says when he's in love with you*”,女性译者张白桦直译为“不能全都按字面意思理解”,黄永华则译为“你把一个男人在热恋着你时说的那些情话,都逐字逐句地当真,是不是有点儿过分了”,后者增译了“过分”这一额外的态度词,赋予了查理更强的性别立场。又比如,凯蒂和查理的感情还未破裂之前,面对查理的调笑,凯蒂说道:“*You'll be adorable when you're a hundred*”,黄永华将其译为“你就是老了,也能迷倒女人”。而根据原文语境,没有任何信息指向“迷倒女人”这层含义,男性译者增添了女性角色在语言中对男性的崇拜意味,导致这里凯蒂的形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

(二) 女性情感的再述

译者的性别身份不仅会影响其在译文中对不同性别形象的塑造,还会影响对女性角色情感的表达和呈现。对比译文发现,女性译者通常能够对女性角色的复杂情感表现出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更强的同理心。

例 3: He knew how grossly deceived I was in thinking that you were in love with me, because he knew that you were incapable of loving any one but yourself.

张白桦(女)译文:他知道,你一定会在危险当前的时候,跑得比兔子还要快。他知道,我被骗得好惨,以为你爱我。

方华文(男)译文:他知道一有个风吹草动,你溜得比谁都快。他知道我受到了欺骗,竟认为你爱上了我。

黄永华(男)译文:他知道,遇到危险,你会跑得比兔子还快,也知道,我以为你一直爱着我是在自欺欺人。

原文语境中,凯蒂对查理的控诉除了被骗的愤怒,还包含梦碎的无助与伤痛,其指责是歇斯底里的哭喊。张白桦作为女性译者,其译文最先捕捉到这一层情绪,她将“*how grossly deceived I was*”翻译为“我被骗得好惨”,译文简洁直白,在情感上给读者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强化了凯蒂话语中的痛苦与怨恨。

相比之下,两位男性译者的译文则没有将凯蒂的这一层情绪充分表达。方华文译为“他知道我受到了

欺骗”，弱化了原句中的“grossly”一词。黄永华译为“自欺欺人”，与原文信息略有出入。凯蒂在婚外情暴露前，从未怀疑过查理，甚至天真地认为查理会为了她和他的妻子离婚。值得注意的是，凯蒂和查理的第一次言语冲突是凯蒂独立意识萌芽的起始，张白桦译文中的凯蒂，在言辞上情绪更为饱满，为后文凯蒂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人物行为逻辑前后连贯，而这是塑造凯蒂形象非常重要的一环。

例 4: Kitty blazed with sudden anger. “I suppose I threw myself at your head. I suppose I gave you no peace till you yielded to my entreaties.”

张白桦（女）译文：吉蒂勃然大怒，“我想是我送上门去的。我想是我不让你有片刻安宁，苦苦相求，直到你从了我为止。”

方华文（男）译文：凯蒂立时勃然大怒，说道：“是我向你投怀送抱吗？是我恳求你，搅得你不得安宁，非让你爱我不成？！”

黄永华（男）译文：吉蒂蓦然间怒火中烧，“是我当初主动将自己投入到你的怀抱的吗？是我当初硬逼你答应我，否则就搞得你鸡犬不宁的吗？！”

例 4 的语境是凯蒂的婚外情暴露之后，情夫查理为了自己的仕途全然不顾凯蒂的艰难处境，凯蒂在识破查理真面目后绝望地控诉。这三版译文体现出来的人物情感差别显著。

张白桦延续原文的表达方式，其译文中的凯蒂，语气是平静中透露着绝望；黄永华和方华文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使用了更加地道的中文表述，例如“硬逼你”“鸡犬不宁”等，且用反问句来处理原文，加重了凯蒂的语气，将其内心的愤怒显化。

女性译者张白桦的译文语境中，凯蒂的情绪不仅是愤怒，还包含看透查理真面目后的绝望与无力；两位男性译者使用一连串的反问句，在感受上更为直观，但是削弱了凯蒂此时情绪的复杂感，读者体会到的情绪较为单一。

例 5: “I don’t think any one could reasonably blame me for refusing to go to a dangerous place where I had no business or where I could be of no use.” “I’m not going, Walter. It’s monstrous to ask me.”

张白桦（女）译文：我认为谁都没道理指责我，因为我拒绝去的是一个危险地方，那里本与我无瓜葛，在那儿我无事可做、没有用武之地。我不会去的，瓦尔特。你强求我去太不公正了。

方华文（男）译文：我觉得要是拒绝去一个既跟我无关、也用不上我帮忙的危险之地，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责怪我。反正我是不会去的，沃尔特。让我去那鬼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

黄永华（男）译文：我认为，没有人会因为我拒绝去一个我根本没有用也帮不上忙的危險地方，就责怪我。我不去，沃尔特，这太没有道理啦。

例 5 引自原著第二十二章，是凯蒂拒绝丈夫同他一起前往霍乱肆虐的湄潭府的请求。三版译文中凯蒂的态度和言语中的重点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在女性译者张白桦的译文中，凯蒂首先严厉指明“没有任何人有道理指责我”，强调了作为独立个体，拒绝的权利不疑有他。但在两位男性译者的译文中，凯蒂的拒绝是有前置条件的，即“湄潭府是个危险之地”，暗含“拒绝需要充分理由”之意。女性译者张白桦采用分译的翻译方法，将原句拆分成多个短句，充分表现了凯蒂的坚定，补偿了凯蒂在文中的形象。

此外，在面对丈夫沃尔特强硬的态度以及不合理的请求时，三位译者对凯蒂的回应 “I’m not going, Walter. It’s monstrous to ask me.” 的翻译也非常值得探讨。张白桦将 “monstrous” 处理为 “不公正”，展现出凯蒂强硬的拒绝态度，说明这版译文中的凯蒂和男性对峙时，从始至终都清楚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并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相比之下，两位男性译者的译文虽然都清晰表明了凯蒂的态度，但没有表现出凯蒂在这种情况下所体现出来的“反抗”，黄永华的译文 “我不去，沃尔特，这太没有道理啦” 甚至带有轻快的语气，不仅不符合凯蒂此时的情绪，反而弱化了凯蒂身为女性敢于挑战男权的这一层形象。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无法详细分析所有例证，但通过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男性译者在翻译女性语言、把握女性角色情感上，相比女性译者要稍逊色。这导致男性译者译本中凯蒂的形象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男女译者出现性别视角差异的原因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知，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的性别确实会影响最终译文的呈现，那么，这种由性别视角引起的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本部分将

借助斯坦纳的诠释学翻译框架,进一步探究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

诠释学翻译理论的四个步骤分别是相信(trust)、入侵(aggression)、吸收(import)和补偿(compensation)。“相信”体现的是译者在选择翻译对象上的主动性,即译者选择相信文本是可以被理解的,其中蕴含的信息在转换过程中不会变成空洞无效之物(Lawrence Venuti, 2004: 198)。而“入侵”“吸收”和“补偿”体现的则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本部分主要从这三个步骤考察译者在译本中重现性别形象的异同。

通过前文的案例分析可知使最终译文出现差异的是译者在“吸收”和“补偿”阶段使用的翻译策略。两位男性译者,尤其是黄永华,倾向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且为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他们会在译文中增译一些语气词,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放大了原文男性与女性角色的性格特点。而在“入侵”的阶段,即对文本的理解上,他们则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这两个阶段体现的是译者能动地处理原文和控制翻译的能力,是其在优势语言中产出新文本的过程,极大可能会带入自己的文化背景和主观意识,译者的性别视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作用的。

那么为何在涉及到译者的文化背景时,译者的性别意识就发挥作用了呢?这是因为不同性别的译者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模式,由此造成的性别差异会延续到语言使用中。早期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关注到语言使用中的性别差异后,认为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用词、语体等方面。就语体而言,Lakoff指出“女性说话所用的语体要比男性的委婉、犹豫、含混。女性语体(female style)的运用者显然不限于妇女,关键在于说话者是‘无权’的人”(乔令先、王政伟, 2009: 62)。从人类历史学的角度来讲,这与妇女长期以来处于附属地位分不开,“弱者的心态表现在语言上自然是比较踌躇、委婉”(乔令先、王政伟, 2009: 64)。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为何女性译者在翻译男性语言时用词要稍显缓和。

弗洛图在研究男女语言差异后认为女性在进入公共领域时必须将女性语言翻译到父权语言之中,因而女性都是“双语人”(bilingual),具备至少两种看待现实的视角;而男性处在权力关系中的主人地位,因而视角单一,在翻译女性作品时,男

性的这种狭隘视角就被暴露出来(李玉红, 2009: 65)。虽然女性译者张白桦并未在原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男性角色的权利主导地位,但这解释了为什么男性译者在翻译较为细节性的女性情感表达上会有所欠缺,还会不自觉地强调角色的男性身份立场。

对比分析三个译本还发现,在翻译原文中已外化的女性主义表达时,三位译者在译文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即都能够很好地传达原句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这是因为《面纱》在中国被冠以经典女性主义读本之名,加之本文选取的三个译本较新,译者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予“女性主义”额外的关注。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便有足够的前知条件,译者的性别身份对翻译原文的影响依然会体现在各种细节上,而这要求译者必须主动培养性别意识,并将其贯彻在翻译的每一个步骤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原文人物形象的前后一致,从而更好地传达原文内涵。

五、结语

本文借助斯坦纳诠释学翻译理论,对比分析了毛姆的《面纱》的三个中文译本,讨论了三名译者在还原小说男女主角形象上的异同,以及这些差异所反映的性别意识。研究发现,译者性别身份对其性别意识的影响在翻译已外化的女性主义表达上并不显著,其更多地表现在隐晦的性别话语翻译上,例如男女角色语言的翻译或女性形象的重现,其中,女译者更能捕捉女性角色微妙的情感变化,并积极地使用分译、增补等翻译方法和技巧在语篇层面上补偿女性在译文中的形象;而男译者在翻译男性角色语言时,更易受制于传统男性思维模式,遵从特定的性别规范,致使译文中男性语言存在对女性的性别成见,而这种性别成见并不来源于原文,而是译者的主观倾向。由此可见,性别身份确实会对译者的性别意识产生影响,并显化在译文中。

但是,近些年女性主义受到的高关注度使许多译者在翻译中关注到这个问题,在已建立共识的女性主义话语上,无论是男性译者还是女性译者,都能清楚意识到并忠实翻译,这说明译者可以通过翻译过程中的主动干预,探索女性主义的多元表达方式,主动建立性别意识,根据语境调整翻译的性别视角,以提高翻译的整体效果。

参考文献

- [1]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Hove: Psychology Press, 1996.
- [2]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3] Von Flotow L.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7.
- [4]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J]. 中国翻译, 2003 (1): 21-26.
- [5] 李红玉. 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谈性别视角下的《紫色》四译本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8 (2): 19-28.
- [6] 李红玉. 女性主义翻译的先锋——芭芭拉·戈达尔德 [J].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2): 62-67.
- [7] 乔令先, 王政伟. 女权主义翻译: 追求社会平等的历史过程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 (6): 62-65.
- [8]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面纱 [M]. 张白桦, 译.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8.
- [9]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面纱 [M]. 方华文, 译. 江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
- [10]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面纱 [M]. 黄永华,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 [11] 徐来. 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 [J]. 中国翻译, 2004 (4): 18-21.

A Study of Translator's Gender Ident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einer's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the Re-portrayal of Gender Images in Thre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Painted Veil* as An Example

Xia H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As the re-creator of the texts, translator's gender ident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ranslation proc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t can exer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ranslator's strategy choices as well, thus leading to varying degrees of alteration in feminist connotations or gender portrayals in translated works. In *The Painted Veil*, Maugham portrayed distinct female and male characters, depicting a patriarchal society wherein men represent power and women embody repressed female consciousness. However, notable discrepancies emerged between translator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reproducing the portrayals of the same male and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Female characters are undervalued in translations by male translators. This suggests that translator's gender identity can subconsciously influence the re-portrayal of gender images in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shall move beyo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ir gender identity, proactively cultivate gender awareness to explore the subtle emotional changes of characters, and employ gender-inclusive language to treat every character in the source text equitably, thereby conveying the ideas of source text more accurately.

Key words: Gender identity; Literary translation; Hermeneutics; Character re-portrayal